

20 世纪 90 年代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

魏立华¹, 丛艳国², 李志刚³, 闫小培³

(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广州 510641;

2.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 广州 510642;

3.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 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 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 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 分析 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 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 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 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在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 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 19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 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 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 职业空间分异; 区位商; 机制; 广州市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集中在“后福特主义”的经济重构和社会极化, 对空间的关注导致“社会生态学”的复苏^[1], 全球性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被社会空间极化所取代, 全球化进程可增加城市社区的社会复杂性和空间分异^[2]。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 东欧、中国等地区或国家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得到增强, 这些城市在市场化、内城更新、郊区化等进程中产生着巨大的社会空间分异, 私有化和产权的重新分配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最为巨大^[3]。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从住房市场和土地市场的研究切入的, 如住房改革产生空间效应, 城市社会空间按不同建设时期与不同住房来源等发生分异^[4, 5],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社会空间“秩序”仍具有很大的惯性^[6, 7], 或者说社会空间的进一步分异是建立在城市结构的历史性演进之上, 因为同等的收入水平、基于单位的住房供给促使居民在居住上并无差别。城市空间演进具有历史继承性, 这意味着城市空间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空间层”叠加而成的, 社会空间的重构要比物质空间的改变迟缓的多, 众多居民的居住流动与社会流动, 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类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来看, “单位大院”构成其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一个主要出发点, 因为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住房的“集体消费”来构建社会空间,

收稿日期: 2006-09-24; 修订日期: 2007-01-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0608033; 40601033)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50608033; No.40601033]

作者简介: 魏立华 (1977-), 男,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城市社会空间、城市规划与管治等方面的研究。

E-mail: weilh@scut.edu.cn

社会区是建立在土地利用而非社会阶层分化之上^[8], 工业用地类型表征的就是工人阶层聚居区, 学校即是知识分子聚居区。但是, 这些研究已难以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化改革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深入, 中国城市正处于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衡状态”向“混合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稳定的以单位为单元的城市社会空间迅速分化, 旧的社会空间类型被解构, 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又不断出现, 有关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新机制”的研究不断涌现。研究认为“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因素、家庭结构因素和居民的择居行为等加剧着城市社会区的分化^[9]; 并且“全球化力量”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 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很大^[10], 劳动密集型跨国资本的进驻正急速改变城市社会空间。

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社会属性相近的人通常依据种种理由聚居在一起, 形成社会空间分异, 通常选取大量的社会、经济、住房等指标, 利用因子生态分析、聚类分析等技术来研究城市整体的社会空间分异^[11, 12]; 二是“自下而上”的方法, 建立在对家庭或居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基础上, 试图通过个体居民(或家庭)的生活轨迹来理解城市社会空间的演进过程和机制^[13], 甚至通过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故事”来折射城市经济急剧转型所造成的社会空间巨变^[14]。社区区分析主要是从街道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入手, 亦有从居委会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入手^[15, 16], 这种基于“宏观数据”的社会区分析在国内的研究较为成熟, 不过从研究所得出的社会区类型来看, 因就业分布而导致的以职业区分的社会空间分异非常明显, 如工人居住区、知识分子聚居区、机关干部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白领集中居住区、高级职业者聚集区等等^[16-19], 这表明不同的职业类型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很大。

其他学科, 如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有关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多停留于“社会性”的描述层面, 如下岗工人及农民工在城市里的隔离、邻里间收入的不均衡、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等等。社会的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否表征为居住的分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更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尤为重要的是, 社会空间分异不应当从其绝对的静态层面来理解, 而是从动态的过程来思考, 如经济转型、全球化、乡城移民等因素是否会产生一种社会空间分异的趋势。鉴于职业类型与居民的教育水平、社会等级、收入、社会认可度之间高度正相关, 职业的空间分化成为反映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突破口。本研究利用 1990 年、200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借助区位商来分析广州市 20 世纪 90 年代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特征, 借此来阐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机制。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的界定

研究的地域范围是传统意义上的广州市区, 即越秀区、荔湾区、东山区、海珠区、天河区、芳村区、白云区和黄埔区等八区(未考虑 2000 年以后新增的番禺区、花都区、萝岗区、南沙区等), 面积 1434.6 km²。20 世纪 90 年代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的考量数据源于“四普”、“五普”中街道层面的数据, 由于这一时期街道的行政调整频繁, 如内城的街道多“合二为一”或“合多为一”, 郊区的镇(乡)因城市建成区的蔓延又拆解为若干街道, 因而在对广州市 1990 年、2000 年两个时间断点进行 GIS 分析的时候, 属性数据难以落实到同一空间范围内, 无法对某一街道在 90 年代社会空间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确定一批街道, 折算出隶属于该街道的新的属性数据, 最后经确认的街道总数为 83 个, 其中海珠区 12 个、黄埔区 7 个、荔湾区 12 个、芳村区 5 个、越秀区 10 个、东山区 10 个、天河区 9 个、白云区 18 个。

2.2 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研究，并没有对所有的职业类型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而是分为“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和政府机关职员”等四大类。① 工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② 低端服务业包括：“四普”中的“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房地产管理、公共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类型；“五普”中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类型；③ 高端服务业包括：“四普”中的“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五普”中的“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类型；④ 政府机关职员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广州市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包含了 13 个行业类型，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包含了 16 个行业类型，7 个职业类型。若这两个时间断点进行对比分析，须将“五普”数据中的部分行业归并，且与“四普”数据相对应。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四个职业群体：工业从业者、低端服务业从业者、高端服务业从业者和政府机关职员，并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 指标对这四种职业群体的居住分异进行分析。区位商可用以衡量某一职业从业者在某一特定街区居住的相对集中程度，进而判别该街区对某一社会阶层的吸引力，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LQ_i = \left(O_i / \sum_{i=1}^n O_i \right) / \left(P_i / \sum_{i=1}^n P_i \right)$$

式中： LQ_i 是街道内 i 职业从业者聚居的区位商， O_i 为 i 街道某一职业（或群体）的从业人数， P_i 为 i 街道的从业人员总数， n 为街道总数。若某街道某一职业的区位商值为 1，则表示该街道 i 职业从业者的聚居程度与全广州市相同，若 LQ_i 大于 1，则表示该职业从业者在某街道相对集中， LQ_i 值越大，则聚居程度越高，该街区对这一职业从业者的相对吸引力越大。

3 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

3.1 1990~2000 年广州市各区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总体变化情况

从广州市各区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比例变化来看（表 1），1990~2000 年内城区的越秀、荔湾、东山等三区工业从业者比例急剧下降，分别从 1990 年的 39.39%、50.45%、33.19% 下降到 2000 年的 22.14%、26.14% 和 17.93%；工业从业者比例下降的同时是低端服务业从业者比例的上升，如越秀、荔湾、东山三区分别从 1990 年的 32.55%、29.39%、29.07% 上升到 2000 年的 48.18%、50.63% 和 44.00%，同时其高端服务业从业者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说明 1990 年代内城区城市职能从偏重工业向商贸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的转变。郊区的白云、黄埔两区的工业从业者比例继续升高，分别从 1990 年的 31.63% 和 45.69% 上升到 2000 年的 42.48% 和 52.15%。

从全市层面来看，工业从业者比例有小幅下降，从 1990 年的 40.59% 下降到 2000 年的 36.79%，主要是内城区工业从业者的减少被郊区工业从业者的增加所抵消。此外全市八个区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比例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升幅最低的黄埔区仍达到 10.66%，升幅最高的荔湾区更是达到 21.24%，这说明广州市商贸服务业并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全面性的提升。

3.2 1990~2000 年广州市工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

从广州市 1990 年工人聚居的区位商分布状况来看（图 1a），工人的相对聚居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兴建的工业区或厂矿集中区一一对应，反映出“社会主义单位制生

表 1 1990~2000 年广州市各区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变化
Tab. 1 The distribution of professionals across districts of Guangzhou, 1990~2000

职业	比例%	越秀区	荔湾区	东山区	海珠区	芳村区	天河区	白云区	黄埔区	全市
工业	1990	39.39	50.45	33.19	47.54	48.64	37.09	31.63	45.69	40.59
	2000	22.14	26.14	17.93	38.77	43.83	32.15	42.48	52.15	36.79
	变化	-17.25	-24.31	-15.26	-8.77	-4.81	-4.94	+10.75	+6.46	-3.80
低端服务业	1990	32.55	29.39	29.07	20.55	17.73	18.28	11.62	12.48	21.62
	2000	48.18	50.63	44.00	36.98	31.05	40.46	25.05	23.14	34.39
	变化	+15.63	+21.24	+14.93	+16.43	+13.32	+22.18	+13.43	+10.66	+12.77
高端服务业	1990	8.55	5.25	12.46	7.77	3.62	15.83	3.86	4.18	7.84
	2000	13.20	8.40	17.04	8.54	4.18	11.83	3.60	3.69	7.87
	变化	+4.65	+3.15	+4.58	+0.77	+0.46	-4.00	-0.26	-0.49	+0.03
政府机关职员	1990	12.15	6.39	11.93	5.34	2.56	7.44	2.99	3.52	6.67
	2000	7.50	5.17	8.36	2.95	2.92	3.61	2.14	2.89	3.61
	变化	-4.65	-1.22	-3.57	-2.39	+0.36	-3.73	-0.85	-0.63	-3.06

资料来源：广州市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广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产—生活体系”的特点。内城区的荔湾、越秀、海珠等区仍布局有较多的工业企业，如荔湾区的南园、彩虹、龙津、金花、逢源、华林等街区因靠近传统的西村工业区（广州发电厂、广州水泥厂等），海珠区工业大道沿线的龙凤、沙园、南石头等街区因靠近传统的南石头工业区（广州造纸厂、造船厂、橡胶厂等），其制造业工人的相对聚居程度较高；郊区则因计划经济时期零散的工矿企业，其工人高聚居街区呈“分散状”，如鹤洞（广州钢铁厂等）、员村（轻纺、化工）、车陂（化纤、广州氮肥厂等）、长洲（黄埔造船厂等）、红山（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等）以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

从广州市 2000 年工人聚居的区位商分布状况来看（图 1b），西村、员村、赤岗等传统老工业区工人的相对聚居程度迅速下降，其中荔湾的西村更是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表明旧城职能转换及工矿企业郊迁的效果。白云区的石井、新市、蚌湖等镇工业发展迅速，工人相对聚居程度较高，缘于其靠近机场、京广铁路等优越的交通条件而有利于接受内城“外溢”的工业。此外，天河区的东圃镇至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线呈现出工人相对聚居的最高区位商值，该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先后建成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吸引了众多国际性生产资本的进驻。从工人高聚居街区的空间分异来看，2000 年内城区工人聚居程度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而 1990 年郊区呈零散分布的工人高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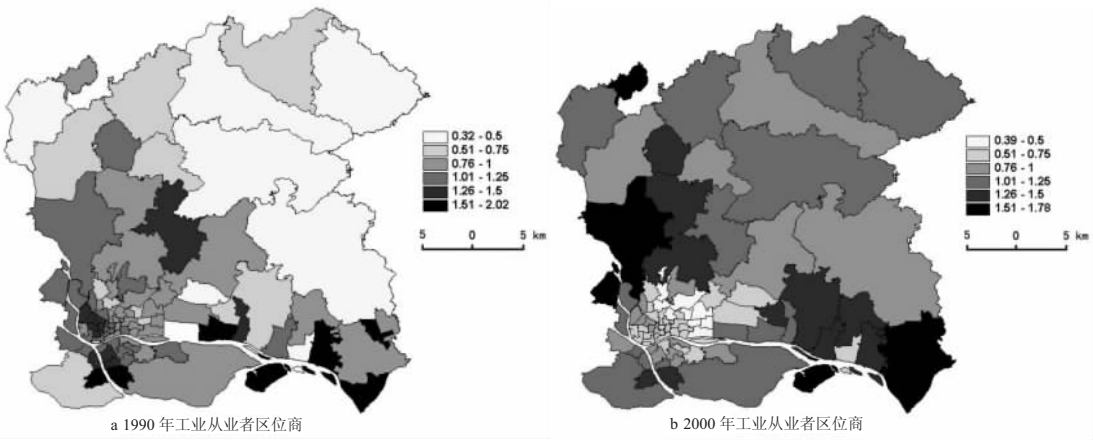


图 1 1990~2000 年广州市工业从业者的区位商
Fig. 1 The location quotient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Guangzhou, 1990-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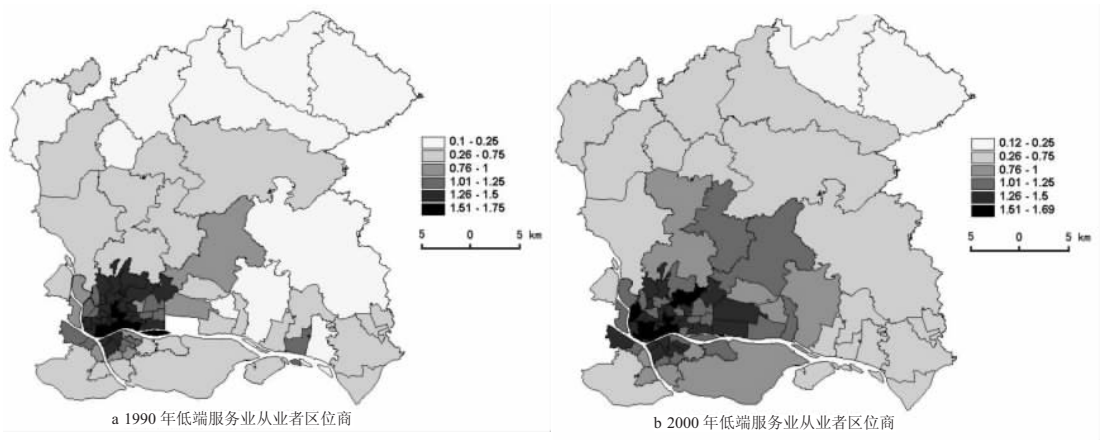


图 2 1990~2000 年广州市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区位商

Fig. 2 The location quotient of low-level service workers in Guangzhou, 1990-2000

居街区到 2000 年时已连接成片，形成东部“东圃镇(天河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除黄埔区的黄埔街之外)”和北部“白云区石井镇—新市镇—蚌湖镇”等两个工人聚居带。

3.3 1990~2000 年广州市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

广州市 1990 年低端服务业从业者主要聚集在内城区(图 2a)，尤其是珠江北岸的岭南、华林、人民、大新、光塔、六榕、北京、珠光、白云等街道，为传统的商业区，北京路、上下九路等商业街等布局于此；火车站及环市路附近街道因便利的交通条件，分布有众多大型批发市场，低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程度亦较高。

2000 年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区位商最高值仍位于内城区(图 2b)，如北京路、上下九路等周边街区，该地区为广州市传统商贸集中区(旧 CBD)；而 20 世纪 90 年代天河体育中心带动了其周边商贸业的迅猛发展，石牌街、珠江新城等已成为广州市新的中央商务区(新 CBD)，但由于该区集中了杨箕、林和、冼村、猎德、石牌等五个“城中村”，这五个“城中村”聚居了十几万外来人口，其中绝大部分从事低端服务业。

3.4 1990~2000 年广州市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

从广州市 1990 年高端服务业从业者区位商值的空间分布状况来看(图 3a)，东山区普遍较高，说明东山区各街道知识密集型行业从业者聚居度较高，其中以黄花岗、农林两个街道为最；除此之外，天河区的五山、石牌和海珠区的新港、赤岗等四个街道因集中了众多高校、科研院所，街道内居民多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最密集聚居之地，同时由于 1990 年广州市从事工业和低端服务业的外来流动人口不多，各科研院所集中街区并未受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的冲击，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高聚居度得以凸显。

2000 年广州市高端服务业从业者仍集中于传统的高校密集区(图 3b)，如五山、新港等街道，但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环市路一线云集了众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商务办公楼等，如东风、流花、六榕、洪桥、建设、华乐、黄花岗等街区成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此外石牌街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区位商从 1990 年的 3.35 下降到 2000 年的 2.11，主要是因为辖区内低端商贸服务业的急剧发展，外来低素质人口大量涌入，使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相对聚居度有所下降；而海珠区的赤岗街从 1990 年的 2.67 下降到 2000 年的 1.84，则主要归因于辖区内大量“城中村”，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增速太快。另需注意的是，珠江新城尽管已被确定为广州市新的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中央商务区，但因尚未建成(大片土地仍是空地)，入住的高素质人口较少，而辖区内的冼村、猎德等两个“城中村”2000 年总人口为 45 584 人，户籍人口为 15 521 人，无论外来人口，还是户籍人口，其素质均较低，故珠江新城 2000 年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区位商仅为 0.33，远低于全市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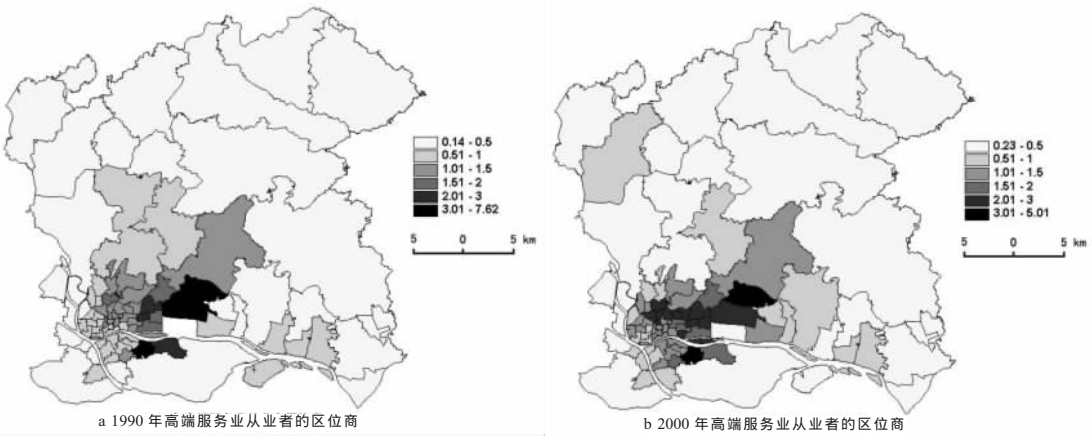


图 3 1990~2000 年广州市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区位商

Fig. 3 The location quotient of high-level service workers in Guangzhou, 1990-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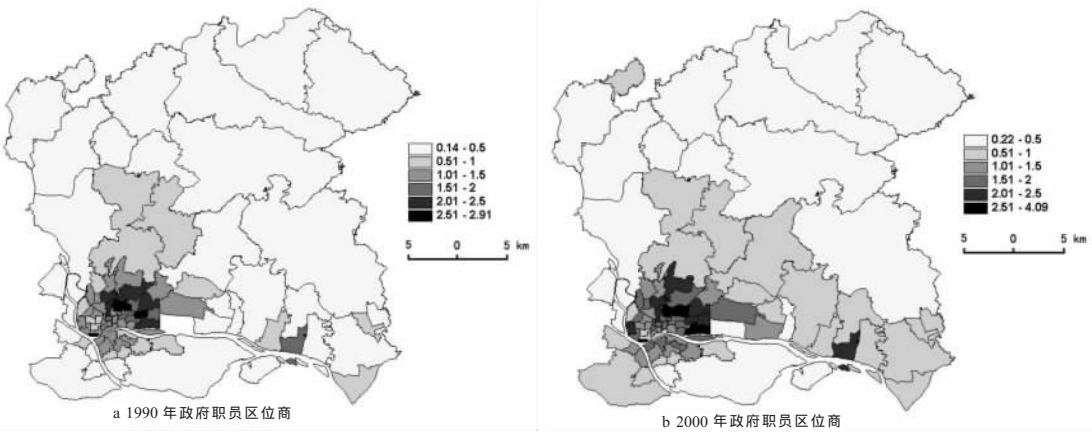


图 4 1990~2000 年广州市政府机关职员的区位商

Fig. 4 The location quotien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Guangzhou, 1990-2000

水平。

3.5 1990~2000 年广州市政府机关职员的空间分异

广州市 1990~2000 年政府机关职员的空间分布变化不大 (图 4a, 4b), 仍集中于东山区和环市路沿线街区, 尤其是 2000 年东湖、洪桥、建设、华乐等街道的政府机关职员区位商更是达到 2.51 以上, 这表明政府机关办公区和职员居住区在空间上是重合的, 并且这种趋势仍将延续下去, 除非政府机关办公区和生活居住区发生“空间断裂”, 即政府办公区搬迁。此外, 沙面因云集了多国的驻广州领事馆、黄埔街是黄埔区的行政办公中心, 其政府机关职员区位商亦很高。

4 1990~2000 年广州市职业空间分异的机制

4.1 城市空间扩展, 新区建设等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广州城市扩展加速, 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 年 12 月)、高新技术开发区 (1991 年 3 月)、保税区 (1992 年 5 月)、出口加工区 (2000 年 4 月) 等, 面积达 110 km², 基本形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电子及电器制造、食品和包装材料等主导行业群。20 世纪 90 年代天河被确定为新城市中心, 众多生

产性服务业部门在此集聚; 北部白云区、南部海珠区交通条件大大改观, 内城工业企业加速郊迁, 郊区大型商品住宅区涌现。

从广州市旧城区和郊区的人口变化状况来看, 1990 年旧城区人口总量为 233.41 万, 2000 年为 233.52 万, 10 年间仅增加 1100 人; 而 1990 年郊区人口总量为 160.11 万, 2000 年为 384.58 万, 10 年间增长了 1.4 倍, 净增 224.47 万人^[27]。从广州市各区人口变化情况来看, 1990~2000 年内城区的越秀区、荔湾区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 -2.53 % 和 -1.54%, 成为人口净迁出区; 东山区年均增长率仅为 0.2%, 1990~2000 年的 10 年间仅增加 11 200 人; 而同一时期芳村、天河、白云、黄埔等区人口增长迅速, 天河区年均增长率更达到 9.94%, 是广州市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区。从 1994~1998 年广州市住宅供应量来看, 海珠、天河、白云三区占 70%, 东山、越秀、荔湾旧城区只占 10%。不难看出, 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是在城市急速扩展、人口急速增长的背景下进行的, 旧城区的职业重构与新城区的新增职业共同影响着这一时期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 并且后者的影响要更为显著一些。

4.2 经济全球化等促进城市不同职业分化

广州市 1990~2000 年基于经济转型使然的、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共性特征。1990 年以来导致广州市社会经济空间不均衡 (socio-economic spatial inequality) 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对地方社区的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及城市的各项制度性改革;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资本及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与城市职业的等级分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经济重构促发城市社会不均衡化^[20, 21]。1990 年代中国城乡急速的社会经济转型, 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构成了广州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宏观背景, 国际性生产资本的进驻在不断吸引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也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 (producer services) 的发展和“城市决策职能 (head-office functions)”的增强, 这种由服务业所引导的新的职业类型, 以及日益极化的职业分层正加速改变着城市社会空间^[22], 如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的涌入, 本地农村已难以满足其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跨区域的乡城移民承担了几几乎所有的低技术、低收入的制造业及低端服务业职位; 本地村民则“退而造房”, 依托农村宅基地兴建大量的出租屋, 演化成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 “城中村”正是这一时期广州市所出现的独特社会空间类型^[23]。另一方面, 与国际性生产资本相伴随的是部分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以及专业性较强的高级职员, 如生产者服务业及白领阶层。

从投资区位来看, 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多布局于距离 CBD 较远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郊区等; 而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多布局于政府行政中心或 CBD 附近。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将部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移到广州市, 推动其产业结构的重组, 重化工业迅速成长, 传统的轻工业趋于衰弱, 1990 年广州市轻重工业比重为 63.97:36.03, 而 2004 年为 46.6:53.4^[24], 与此相关联的是工人聚居区由靠近旧城区的国有企业转型为郊区的外资企业。

4.3 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

有关城市空间分异的研究已转向政府, 将其政府视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的重要动因^[25]。全球化对城市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 形成诸如金融业、生产者服务业、信息产业等白领职员, 下岗的制造业工人、低端服务业从业者、“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等蓝领职员及“边缘化”群体等等。原社会主义“单位制生产—生活体系”所塑造的社会平等、融合的氛围瓦解, 分异 (differentiation)、不均衡 (inequality) 甚至是隔离 (segregation) 凸显, 这预示着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为迎合国际化资本, 政府调整了经济政策及城市规划策略^[26], 城市竞争力成为城市政府关注的核心, 招商引资得到普遍重视。原国有单位制工厂因面临巨额的改革 / 改造成本, 长期亏损, 投资不足, 难以得到国际化资

本或政府的投资,逐步破败衰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州市政府倾向于资金技术密集型资本,引进的大型跨国公司均选址新建在社会主义“单位制”工厂的外围,如黄埔区、花都区以及2005年新成立的南沙区等。

在城市生产性职能向远郊区扩张的同时,内城优越的人文积淀吸引各种类型的高端服务业职员,旧城更新、产业结构升级等使原内城居民不断被置换出去,1985年广州市56%的工厂集中于市区,平均每 km^2 有26家工厂,工业用地占了城市用地的30%,形成工业包围住宅,住宅围困工厂的局面。1987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确立,市场机制引入旧城区改造,1990~1995年就动迁人口140多万,大批工业企业被疏散到距离旧城区不远的周边地区,如荔湾区的旧城改造拆迁户很多迁居佛山市南海区的黄岐镇等地;高收入阶层日益向CBD、郊区或远郊区的高级居住区聚居,如番禺区、花都区等兴建的针对广州市高端服务业职员的高级别商住区;农民工、工人阶层日益向“城中村”、郊外拆迁安置区、内城破败公房区聚居;在城市急速扩展过程中,郊区的社会空间结构日趋多样,从原来单一的农民社区转变为“农民、外来工、白领”等多样化的社区,这些社区在空间上临近,但却以隔离的形式存在^[27]。

4.4 土地开发的市场化与住房的商品化

社会主义时期的“完全就业和国家福利性供给制度^[21, 22]”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同职业间的空间分异度,这一时期的社会空间分异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非“城市内部”。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单位制由“工作—生活统一体”逐步向单一的就业场所转化,国家平均性的再分配体制瓦解,不同职业群体因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力的强弱不同而日益分化,社会福利退减的政策背景催生出商品化的住房政策,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对居民的住房选择能力产生决定性影响,1990~2000年商品房竣工面积年均增幅为20%,实际住房销售面积年均增幅为17.4%,2000年广州市实际销售的商品住房面积达到507.36万 m^2 ,其中个人购买的面积为466.6万 m^2 ,占92%。说明个人已摆脱单位的束缚在市场上购买适应其社会地位的商品住房,“单位制”单一的居住格局被打破,住房商品化所造成的多元化社区出现。另一方面,土地开发的市场化赋予不同区位或条件的土地以不同价值,开发商的逐利造成有选择性的城市重建。不同区位差异化的再开发价值得以体现,拥有好的地段或升值潜力的旧有社区率先被更新,居住质量大大提升;而为开发商所遗弃的其他部分旧城则衰败下去,形成高级商品房住区和底层聚居区(如“城市角落”、城中村、下岗工人社区)等两极格局。

城市从业者拆解为“体制内”从业者和“体制外”从业者,后者的分化更为强烈,如下岗工人、低端服务业职员、高端服务业白领等等。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分房制度已经瓦解,但由于大量历史时期留存的公有住房的存在(尽管这一类型的住房大部分已私有化),部分“体制内”从业者或多或少还居住在单位社区的自有住房(owned house)里,这些社区,如大学、科研院所等普遍保持着与工作地临近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空间特性。而对于“体制外”从业者而言,其居住格局表现出两极化趋向。由于需通过市场实现住房选择,“体制外”者的住房支付能力(affordability)直接与其居住状况挂钩,由于农民工、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多依照“福特主义模式”生产,缺乏柔性,且收入较低,难以支撑日常性的长距离通勤费用,居住地与工作地多重合在一起,多聚居于“城中村”或旧城衰败社区;而专业性的高端服务业从业者具备长距离通勤的能力和“后福特主义模式”的柔性工作模式,居住与工作趋于分离,甚至在环境较好的郊区形成高等级居住区(suburb citadels),如番禺区大石、钟村等镇的大型白领居住区等。

4.5 计划经济时期不同职业从业者居住分异的惯性与延续

1949~1987年广州市社会空间遵循(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逻辑,依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形成“政府权力部门集中区—郊外国有大中型工矿企业—旧城区商住混杂区—外围

农村”的社会空间序列^[28]。内城区外围兴建了政府机关密集区及其职员聚居区,如东山区、环市路沿线街区等,这主要是考虑到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各部门“近邻办公”以提高效率的要求。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尚在进行之中,旧有的制度依然具有很大的惯性,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仍依托再分配权力而享受着种种“体制内”的福利优惠制度;掌握“再分配权”的城市政府对其机关办公区和职员居住区进行倾向性开发和投资,如 1978 年以来东山区、环市路沿线地带先后兴建了众多教育文化、高等级酒店、商务办公楼等设施;考虑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各个政府部门对资金、产品、人员、土地、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严密控制,“就近政府机关布局”已成为一些高端服务业 (professional services) (如酒店、商务、房地产、各类设计研究院等) 选择区位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某些高端服务业部门本身就由政府机关拨款兴建,并为其提供服务,如多数酒店由政府部门的招待所演化而来等等。因而政府办公区、机关职员聚居区往往与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相重合。从稳定性上来看,工人、农民工往往必须随工厂郊迁或郊区新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流动,政府机关职员则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与许学强等^[17]认为广州市社会空间分异主要是“由历史因素、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造成”的结论相似。

5 结论与讨论

(1) 1990~2000 年工业从业者从内城区逐步向外围交通便捷的近郊区转移,如白云区、黄埔区的若干街镇等,旧城区工业企业的外溢和全球化背景下郊区工业企业的集中布局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由于郊区街道(镇)统计单元面积过大,其工业从业者的区位商并不显著,但工业从业者的绝对数量可能很大。

(2) 1990~2000 年低端服务业从业者一直高度聚居于内城区,尤其是北京路、上下九路等周边街区,该地区为广州市传统商贸集中区(旧 CBD),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育成熟的天河体育中心附近街区成为广州市新的商贸集中区(新 CBD),这与广州市商贸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职能相符合。

(3) 1990~2000 年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集中的东山区及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如天河区的五山、石牌,海珠区的新港西等街区,在空间上呈“扇形”分布。计划经济时期高端服务业机构多依附于或直接服务于政府机关,空间上就近政府机关布局,因而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区位商值与政府机关的区位较为密切。

(4) 1990~2000 年政府机关职员的空间分异变化不大,且与政府机关的布局相符合,说明政府机关的办公职能与其职员聚居区在空间上趋于重合,或者说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通常靠近政府机关的行政办公场所。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广州市商品住房市场发育较快,但并未改变政府机关职员这种“工作—居住”相重合的“单位制生活模式”。

(5) 从 1990~2000 年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分异机制来看,城市空间拓展、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城市发展政策及空间调整、原国家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其主要原因。但从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状况来看,不难发现,各类职业从业者的居住均与工作结合在一起。工业从业者和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工作性质及其收入水平,决定其住所不能离工作场所太远;政府机关职员长期享受国家福利性分房,居住流动 (residential mobility) 近于停滞;高端服务业从业者原来大多在事业单位工作,尽管市场化改革促使部分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进入“市场”,成为“体制外”从业者,但职业变迁、单位更换并未带来居住流动,这与美国城市“工作与居住”空间分离的状况迥然不同^[29]。

有一点须承认,利用街道层面的数据进行职业从业者的空间分异研究有一定局限性,主要是街道的面积差异很大,从几 km^2 到几十 km^2 不等,部分街道人口、空间规模过于

庞大, 这实际上掩盖了街道层面以下的社会空间分异^[16], 如广州市石牌街道涵盖了高等院校、“城中村”等多种类型, 街道水平的统计数据很难反映出这种差异, 因而未来研究中如能进一步采用基于居委会水平的统计数据, 将能进一步深刻揭示其空间分异现象的特征与规律。

致谢: 2004 年 10~12 月作者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地理学院作访问学者期间, 吴缚龙教授、刘玉亭博士、何深静博士等对本研究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Walks R A.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post-Fordist/global c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in the Toronto urban region. *Urban Studies*, 2001, 38(3): 407-447.
- [2] Marcuse P, V Kempen (ed.). *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Oxford: Blackwell, 2000.
- [3] Sykora L. Processes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post-communist Prague. *Housing Studies*, 1999, 14: 679-701.
- [4] Wang Y P, A Murie. 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in urban China. *Urban Studies*, 1999, 36: 1475-1494.
- [5] Wu 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eal estate marke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 1591-1615.
- [6] Logan J R, Bian Y J, Bian F Q. Housing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 7-25.
- [7] Wu 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anghai. In: Logan J R (ed.).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Oxford: Blackwell, 2001. 151-166.
- [8] Yeh A G O, Xu X Q, Hu H Y. The social place of Guangzhou city, China. *Urban Geography*, 1995, 16: 595-621.
- [9] Xiu Chunliang, Xia Changjun. Studies on evolution and trend of urban social districts in China. *Urban Planning Forum*, 1997, (4): 59-62. [修春亮, 夏长君. 中国城市社会区域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势. 城市规划汇刊, 1997, (4): 59-62.]
- [10] Gu Chaolin, Kesteloot C. A research on social spatial polarization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 52(5): 385-393. [顾朝林, C·克斯特洛德.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1997, 52(5): 385-393.]
- [11] Feng Jian, Zhou Yixing. The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s evolution: 1982-2000.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4): 465-483. [冯健,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1982-2000). 地理研究, 2003, 22(4): 465-483.]
- [12] Gu Chaolin, Wang Fahui, Liu Guili. Study on urban social areas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6): 917-926. [顾朝林, 王法辉, 刘贵利. 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03, 58(6): 917-926.]
- [13] Yi Zheng. Residential mobility of urban China in social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PhD. Dissertation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3. [易铮.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居住流动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14] Pavlovskaya M. Other transitions: Multiple economics of Moscow households in the 1990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4, 94(2): 329-351.
- [15] Li Zhigang, Wu Fulong, Lu Hanlong.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ree neighborhoods in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04, 28(6): 60-67. [李志刚, 吴缚龙, 卢汉龙. 当代我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分异: 对上海三个社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规划, 2004, 28(6): 60-67.]
- [16] Li Zhigang, Wu Fulong.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ransitional Shangha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2): 199-211. [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06, 61(2): 199-211.]
- [17] Xu Xueqiang, Hu Huaying, Yeh Gar-on. A factorial ec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9, 44(4): 385-399. [许学强, 胡华颖, 叶嘉安.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地理学报, 1989, 44(4): 385-399.]
- [18] Zheng Jing, Xu Xueqiang, Chen Haoguang. A factorial ecological re-analysis of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Guangzhou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5, 14(2): 15-26. [郑静, 许学强, 陈浩光.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 地理研究, 1995, 14(2): 15-26.]
- [19] Zhou Chunshan, Liu Yang, Zhu Hong. Analysis on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city during the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10): 1046-1056. [周春山, 刘洋, 朱红.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06, 61(10): 1046-1056.]
- [20] Sassen S. Whose city is it? Glob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laims. *Public Culture*, 1996, 8(2): 205-223.
- [21] Hamnett C. Social polarization in global c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Urban Studies*, 1994, 31: 401-424.
- [22] Hamnett C. Social polarizati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 *Urban Studies*, 1996, 33: 1407-1430.
- [23] Wei Lihua, Yan Xiaopei.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village" as informal migrants settlements in developed urban China: A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Management World*, 2005, (8): 48-57. [魏立华, 闫小培.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

- 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 “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 管理世界, 2005, (8): 48-57.]
- [24] Lu Lachang, Wang Jianjun, Wei Yehua.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Guangzhou c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econom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8): 798-808. [吕拉昌, 王建军, 魏也华.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地理学报, 2006, 61(8): 798-808.]
- [25] Marcuse P, Kempen V (ed.). *Of States and Cities: The Partitioning of Urban Sp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6] Wei Lihua, Yan Xiaopei. Studies on the driving forces and model of social space in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A case of metropolis Guangzhou.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6, 22(1): 67-72. [魏立华, 闫小培.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动力及其模式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6, 22(1): 67-72.]
- [27] Wei Lihua, Yan Xiaopei. Studies on the unbalanced and segmented urban social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 A case of metropolis Guangzhou.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06, 30(5): 55-60, 87. [魏立华, 闫小培. 中国大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社会空间的“非均衡破碎化”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规划, 2006, 30(5): 55-60, 87.]
- [28] Wei Lihua, Yan Xiaopei. Studies on urban social space under the preferred heavy industrialization in 1949-1987: A case of metropolis Guangzhou, China. *Urban Studies*, 2006, (2): 13-19. [魏立华, 闫小培. 1949-1987 年 (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006, (2): 13-19.]
- [29] Clark W A V, Withers S D. Changing jobs and changing houses: Mobility outcomes of employment transition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9, 39: 653-673.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rofessionals of Guangzhou in the 1990s

WEI Lihua¹, CONG Yanguo², LI Zhigang³, YAN Xiaopei³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Civi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 College of Forest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3. Center for Urban & Regional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Under a diversity of impacts such a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uburbs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restructurings in the 1990s. Using the 1990 and 2000 census of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residents working in different sectors of Guangzhou. It is found that industrial staff, high-level service workers, low-level service workers and governmental officials show quite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 First,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s of industrial workers move from the central city towards the suburbs, especially Baiyun district and Huangpu district, while that of low-level service workers remain in the inner city,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 of Guangzhou; in contrast, high-level service workers accumulate around government building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Dongshan district, Wushan of Tianhe District, etc; in addition, governmental officials mainly live around their working places. In this sense, it is argued that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Guangzhou'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workers' residence i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work places and residential area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re attributed to the sector restructuring of the inner city, the urban rapid sprawl, the infill of FDI within the suburbs, the adjustment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urban planning, land use as well as housing marketization, and the path-dependency of the 'work-unit' system. Using location quotient to analyze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it provided a better method for the urban social space.

Key words: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rofessionals; location quotient; mechanism; Guangzhou